



国际文坛有所谓“诺奖魔咒”之说,而这个“魔咒”指的就是不少作家在获得“诺奖”之后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或者无法超越自己过往的困境。莫言自己也曾坦言“诺奖魔咒”的存在:“诺奖”确实影响巨大,包括会给获奖者带来不少的烦扰。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在获得“诺奖”后的四年中先后应邀去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至于题字、签名之类那就更是不计其数。在下虽没有对上述数据的准确性进行一一核实,但大体不谬恐也是基本事实。因获得“诺奖”而一跃成为社会名流很正常。会议多、演讲多、题字签名多也自然都是作为社会名流理应承担的一些社会义务,这些恐亦不属所谓“魔咒”之所指,它主要施之于获奖者在获此殊荣后的创作:要么停滞甚至倒退,要么干脆“颗粒无收”。而从这个意义上看,莫言显然没有被这个“魔法”所击中。在睽别自己出版新作10年后,他终于出版了自己的

39年前,作为年轻的幼儿教师,我常常和班上孩子讲故事、聊趣事,所用的画本便是《娃娃画报》,她成了我初步了解孩子的桥梁。5年后,我参加了朱庆坪老师组织的“童话写作班”,就当年的交通条件而言,我与少儿出版社的距离实在不够亲近。我记得,每次在结束上午的工作之后,立刻赶往我心中的童话园——少儿社,午餐都是在公车上吃的。尽管同事们觉得“太辛劳”,但冰子等童话名家的讲课,使我真实地看到了理想的光芒。这种炙热的感觉,现在依然清晰,每每忆起,倍感幸福。值得纪念的是,写作班结业的作业“一棵小芽芽”被刊登在《娃娃画报》上。我知道,这仅仅是写作班老师的鼓励,但却在我心里埋下了写幼儿故事的情结,并在童真的想象力中无限地靠近儿童,成为一个孩子喜欢的幼儿教师。那一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几乎倾尽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为

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一次性收入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2部。此时距莫言获得“诺奖”虽过去了8年,但细看所收入的12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便不难看出在这8年中,莫言的创作其实一直都没有中断,只不过产量有所降低而已,特别是没有新的长篇小说面世。至于这些作品的质量,有继承、有创新;有我们熟悉的莫言,也有前所未见、令人耳目一新的莫言。

在《晚熟的人》中,以往那种打滑的文风不再明显,“溜冰”现象很难看到;题材虽依然取自故乡人事,但奇人异者少了,更多的是聚焦当下,艺术地呈现自己对社会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不再聚焦“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那些十分平凡而不起眼的芸芸众生;过往那种汪洋恣肆、梦幻传奇的东西少了,更多了些冷静直白与静观自嘲;12部作品中的11部都有一个“老莫言”之外的“新莫言”出现。此外还有对深刻性与可读性关系的处理,对叙述主体的“复调”式使用,以及明写实暗反讽的鲜明对比,

“诺奖魔咒”之于莫言

潘凯雄

等等。凡此种不不难看出,在获得“诺奖”8年后,莫言如果依旧不见新作,或是推出的首部新作依旧“一如既往”,那就不是“晚熟”而是“夹生”或“熟大了”,但现实却是他不仅没有停笔,而的确是更“晚熟”。其实,不仅是小说创作,获“诺奖”后的莫言之创作还有了新的拓展,仅就本人读过的《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黄河游》和《饺子歌》等几首长诗而言,确有几分惊异之感,相信读者日后读过一定会有另一番强烈感受:莫言竟然还有这手好功夫?当然,还不止于诗创作,在戏剧领域,不仅是他的名作《红高粱》2022年8月被江苏大剧院改编成《红高粱大剧》而搬上了舞台;与此同时,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可以文化”还推出了莫言的话剧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和影视剧剧作集《姑奶奶披红绸》。

因此,面对所谓“诺奖魔咒”一说,即使这种现象的存在确有一定的依据,但更多只是限于文学创作这单一视角且也未必准确,因为文学评价从来就是见仁见智。“诺奖”后十年身为作家的莫言其作品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这个每四年举办一届的运动会,是上海市级别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竞争最激烈的体育盛会。今年我也有幸参与其中,担任围棋比赛(青少年组)的裁判员。

记得2018年的第十六届市运会,围棋是展示项目,我受邀担任副裁判员。一转眼,四年过去,今年围棋成为市运会正式项目。这次我原本也是副裁判员,但开赛前,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开完领队会的那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上海棋院领导的电话通知,原裁判员吕国梁老师因为接到全国围棋团体赛的派遣任务,由我接任裁判员工作。裁判员要独立负责整个赛场,这是一项非



数量虽不及获奖前那般喷涌,但从他个人十年的综合表现而言,应该可以说是心态更自信,比如《晚熟的人》中所出现的那种更为开阔的视野与小更加娴熟的叙事以及从小说到诗歌、戏剧等领域的拓展;格局更宽广,比如从事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以及进入大学拓宽文学教育业务;状态更松弛,比如涉足新媒体,和读者受众直接进行

对弈在黑白世界中

方芳

常艰巨的任务。和领队教练沟通,和负责老师讨论赛场细节……我度过了异常忙碌的一个星期。11月20日,在16位裁判的共同努力下,比赛圆满结束。

看着赛场上奋力拼搏的小运动员们,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我。其实,我和市运会的缘分,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82年的第七届市运会,我是参赛运动员。和师姐华学明一起代表虹口区队,夺得女子团体冠军。没想到的是,40年后,我会成为市运会围棋比赛的裁判员。

父亲酷爱围棋,受其影响,小学二年级时,我开始学围棋。记得父亲当时说,围棋黑白分明,最有标准。那时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很争气,学了没多久就拿到了上海市儿童组冠军,随后又多次获得上海市少年组和成年组冠军。

队。一年后,我退伍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之后连续3年夺得全国大学生女子冠军。大学毕业,舍不得放下围棋,到《围棋》月刊做了编辑。工作以后,就很少参加比赛了,更多的是做国际比赛裁判和大盘讲解。这时候,也渐渐明白了父亲当时那句话的含义,他希望我在下棋的同时也学习做人的道理,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1991年,我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三届世界业余女子围棋锦标赛,获得第三名。2016年11月,久疏赛场的我受儿时小伙伴的邀请,组队去韩国参加第十届“金寅国手杯”国际中老年围棋赛,五战五胜夺得女子团体冠军,圆了自己的世界冠军梦。

下了四十多年的棋,围棋早已融入我的生活,伴随着我的青春,带给我快乐和痛苦,也让我的人生变得与众不同。

徐弘毅同志的三言两语,是语言的哲学。这种文体有点像格言、谚语、俗语、絮语,但又都不是,或者说它似乎是综合以上各体之长探索出来的一种新文体。弘毅的三言两语,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它来自现实生活的矛盾,来自人际关系的漩涡,来自社会思潮的激荡,来自心灵世界的碰撞。它从客观世界汲取了养分,发现了问题,也接受了责任和担当。它针对生活潮流和思想动向,激浊扬清,扶正祛邪。论是非一丝不苟,辨美丑爱憎分明。它严肃而不失和蔼,直言而不失温婉。

弘毅的三言两语,是思想的果实,智慧的结晶。它的特点是长于思考,它的作用是启迪思考。它面对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面对变幻莫测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从不为表象所迷惑,总是深入事物的内核探索其精髓,抉取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诸如:“对意见和批评,关键不在中听、不中听,而在中肯、不中肯;对于建议,关键不在中意、不中意,而在中用、不中用。”读此类三言两语,犹如洞穴行舟,时有豁然开朗之感。其聪明之处,在于能敏锐地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其潜在的另一侧面或别一层次,从而深化读者的认知。诸如:“不懂不要装懂,也不要甘于不懂或似懂非懂。”如此独特的智言慧语、读来犹如行山阴道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纵思骋智,哲理迭出,这正是它长传读者之口、长记读者之心的缘由。

以言简意赅为美,以机智隽永为趣,是弘毅三言两语的艺术特长。三言两语这种文体,论说的色彩很浓,为了吸引读者,它总是努力赋予某种艺术元素。首先是追求语言的精练,对于形式和内容它总是作反向的努力,形式务求其简洁,内容务求其丰厚,这就形成了一种耐得咀嚼的诗歌的含蓄。譬如:“舍弃一些,才能得到一些。专一,是最大的舍弃,也是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得到。”“避免最差的结果,往往必须追求最好的目标。”这类以少许表现多许的语言,犹如珍珠闪闪发光,照亮事物背后的奥秘,引导读者去深入领略生活中易被忽略而不应忽略的东西。弘毅的三言两语也追求机智和警策的趣味。他苦心孤诣,运用多种方法寻求和表现语言艺术的微妙意味。有时是取相反相成的句式:“光看别人的短处,往往会使自己的长处变短;常看他人的长处,往往会使自己的短处长。”有时是用两极对照的句式:“没有一种办法是无用的,也没有一种办法是万能的。”有时是欲扬先抑:“可以暂时不问收获,但是永远不能忘记劳作。”有时是因果转化:“听不进别人丁点意见,自己何有点滴进步?”有时层层递进:“能用人为人能人,能用能人者为高人。”有时回环反复:“不听成功者之言,多有失败者之事。不听失败者之事,少有成功者之路。”有时将数字错综成句:“朝三暮四,终将不三不四,更不会数一数二。”有时用绕口令说事:“看重轻者,轻而易举。看轻重者,举重若轻。”摇曳多姿的文字,宛若繁花盛开,尽显聪明灵巧之色。

弘毅的三言两语,真乃益人以智,怡人以情,悦人以美。(本文为徐弘毅《三言两语》序,有删节)

岁月的童话

应彩云

襁褓中的儿子购置了少儿出版社的全套《幼年画库》和《中国幼儿知识百科画册》。一段时期里,这些书陪伴和启蒙了儿子对书籍的喜爱。当然,这些图画书也成了我的教育资源的不二选择。2006年,我的桌上有了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因为深爱,我在课堂上与孩子们共读。无论是和我一起看书的孩子们,还是观摩我课堂的教师,几乎无一例外地爱上了这本书。有一天,我在华师大的教室里讲完《猜猜我有多爱你》,便有一半的观摩教师跑去了图书室抢购这本书,我为能引发大家爱书的热情而高兴。由此,我踏入了早期阅读的实践研究,至今“一发不可收”。2008年,以少儿社的绘本为素材,我创新了早期阅读教育资源“情景阅读”,其创新理念和创新方法,已然成为共识。

其间,在不断修订“情景阅读”中,我的团队也在不断地成长:有三名教师成为上海市特级教师,有8位教师成为区域的学科带头人且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团队12名成员中8位教师在上海市教学评优中获一等奖。大家说:绘本的情景,提升了我们的教育效率。现在,“情景阅读”中的许多绘本内容,成为全国许多教师考核与评奖的内容。我以能使优质的绘本走近更多人而倍感荣幸。后来,我才发现:“情景阅读”研究项目,在与少年儿童出版社高度契合的成果呈现中,舒展了我多年的情结——关于童话,关于孩子,关于梦想……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应该是一片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了。但对于专注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来说,继续遨游神奇的孩童世界,正当年。

言微而义宏

吴欢章



寿桃临波上下红

李企高 (中国画)

视障读者的乐园

吴敏

海伦·凯勒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和我的伙伴直面人生,一往无前。在盲人阅览室里,我学会了使用盲人电脑,在荧屏上丰富了我的精神文化生活。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盲人协会举办了全国征文比赛,我的一篇《电话、手机、因特网——我与爸爸的通讯》荣获了全国一等奖,同时也成为上海第一个全国征文

十日谈

阅读徐汇

责编:郭影

籍;每年都送来上海书展的门票,订阅《文学报》和《文汇报》等,与时俱进地帮助视障人士得到最新的阅读体验。多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打造了视障读者三张文化品牌(星光书社、星光影院、星光讲坛),从而丰富了广大视障文学爱好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今,星光书社读书会历经15年时光,这株幼苗已经成长为视障人士心中亭亭如盖的一棵大树。2019年年末,徐图房馆长和陆书记等老师与视障读者在图书馆门前留下了闭馆前的合影。三年过去了,在图书馆建馆65周年之际,一座鹅黄色的新馆在徐家汇核心区拔地而起,新馆名叫“徐家汇书院”,书院里有一个视障读者的书社——星光书社。在那里,我们可以自主体验,可以文化交流,可以阅读指导,可以分享知识,享受人文关怀。徐家汇书院是我们视障读者心中的乐园,更是我们心中的文化圣殿。这里就像是我的精神家园,包容而温暖,滋养了我的心灵,润泽了我的童年。请看明日本栏。

有一束光,闪闪发亮,如夜幕中的星辰,照耀了你,温暖了我,它是盲人眼中的灯塔。有一束光,在盲人漆黑的世界里,为读书人照亮的一盏心灯,燃起了文学之光。透过那束光,我看到了一个个亲切温暖的身影。因为先天性眼疾我辍学在家。迷茫、失落、无措的我来到坐落于南丹东路上的徐汇区图书馆,我感受到温暖宽敞的阅览室里,有一束光照耀到角落里无助的我,一位图书馆老师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小姑娘,看书这么近,要注意保护眼睛。”一双温暖的手搭在了我的肩头,一旁的妹妹说:“老师,我姐姐眼睛不好,但她喜欢阅读我便带她来了。”老师说:“有一个地方更适合你。”我们一起来到盲人阅览室,面对一大堆盲文书籍我手足无措,打开的盲人电脑我也无法操作,失落的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记得2008年5月12日下午,徐汇区图书馆成立了徐汇区视障读者星光书社读书会,区文化局、区残联领导出席并启动了读书会的成立仪式。我与盲人罗彪作为视障代表,发起了“快乐读书·精彩人生”的读书倡议,同时在读书会成立之日举办了“读海伦·凯勒,展自我风采”读书征文比赛活动。

